

# 宋金时期西北地缘政治的变化及特点\*

杜 文 玉

〔关键词〕 西北地区；地缘政治；宋夏；宋金；蒙古

〔摘 要〕 随着唐王室的东迁，政治中心随之向东转移，西北地区在全国地缘政治上的地位大为下降，但是至宋金时期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北宋时期，西北地区是对西夏战争的最前线；宋金战争期间，它是保护入蜀道路的屏障；金朝末年，又是保护中原地区侧翼安全的屏障，具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与隋唐时期相比，这一时期西北地区地缘的特点是：地域范围已经大为缩小，区域内的民族与政治关系异常复杂，地缘意义更多表现在军事方面，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地缘经济与文化意义。

## 一 前 言

地缘政治，作为人类政治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外国学者多认为，地缘政治就是研究空间对国家间政治的影响，或者是研究国际政治与地理环境的互动，根据地理要素来筹划国家的安全政策<sup>①</sup>。中国也有自己传统的政治地理观念，在社会和文化研究领域，“地缘关系”的表现和作用从来没有被有眼光的学者忽视过；在军事战略方面，地缘的作用有时甚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把地缘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引入到研究国内政治、研究各个地区的战略地理结构以及其在全国地缘政治中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便成为不少学者的选择。本文就是从这个意义出发，主要研究西北地区在宋金时期全国地缘政治与军事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及其前后变化情况。又由于地缘政治是一个包容性、开放性很强的研究课题，属于交叉研究的范围，故有学者指出：“任何地缘政治都离不开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的互动影响，地缘政治并不是专谈政治而不谈经济和文化。”<sup>②</sup>因此，人文因素也是研究地缘政治必须涉及的一个方面。西北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自古以来，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就非常频繁，不可避免地这一地区的人文因素形成较大的影响，所有这一切构成了西北地缘政治研究的全部内容。

宋金时期西北地区在全国地缘政治中的地位及其变化问题，目前尚未见有专论出现。但有关这一历史时期西北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等问题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宋金时期在西北地区发生的战争，主要指宋夏、宋金之间的一系列战争，其中前者主要集中在宋仁宗、宋神宗时期，后者主要发生在南宋初期，如富平之战、和尚原与仙人关之战等<sup>③</sup>。其二，宋金对西北地区的经略，包括政治与军事经略两个方面<sup>④</sup>。其三，对这一地区民族关系的研究，主要涉及了宋、金、夏对西北诸族的争取、安抚或控制等问题<sup>⑤</sup>。其四，宋金在西北地区实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北地区在历代地缘政治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项目编号：2009JJJD770026）的阶段成果。

- ① [英]杰弗里·帕克著，刘从德译：《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新华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3 页；[美]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 1965 年版，第 14 页。
- ② 叶自成：《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北京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 页。
- ③ 如赵继颜《北宋仁宗时的宋夏陕西之战》（《齐鲁学刊》1980 年第 4 期）、王曾瑜《宋金富平之战》（《中州学刊》1983 年第 1 期）和尚原和仙人关之战述评（《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3 年第 2 期）、李蔚《宋夏横山之争述论》（《民族研究》1987 年第 6 期）、王伟《浅论宋夏兰州战役及其影响》（《兰州学刊》1997 年第 1 期）等。
- ④ 如陈守忠《王安石变法与熙河之役》（《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80 年第 3 期）、李华瑞《宋夏战争史》（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和《论金朝经营陕西》（《甘肃社会科学》1992 年第 2 期）、曾瑞龙《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中华书局 2006 年版）、周峰《试论金朝对西部边疆的经略》（《东北史地》2009 年第 4 期）等。
- ⑤ 如赵一匡《宋夏对立与河湟地区的民族关系》（《兰州学刊》1987 年第 4 期）、李华瑞《论宋夏争夺西北少数民族的斗争》（《西北民族研究》1991 年第 2 期）、彭向前《试论辽宋西夏金时期西北民族关系的主要矛盾》（《内蒙古社会科学》2004 年第 2 期）等。

施的经济举措,如屯田实边、与诸族之间的商业贸易等<sup>①</sup>。此外,有些学者还对这一时期西北地区的交通、环境、气候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已有的这些研究成果,虽然不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进行的,但是其研究的一些内容与结论对本文的撰写有着较大参考价值,某些思路也颇具启发意义。

宋金时期的西北地缘政治问题,既是唐末五代时期西北地缘政治的继续,但又有所变化,从而形成了不同于前一历史时期的一些特点。

唐末五代时期,西北地区在全国的政治与经济地位无疑是下降了,这种下降也标志着其地缘政治地位的逐渐衰落,这一变化并非从天祐元年(904年)唐朝迁都于洛阳开始,而应该早于这个时间。提出这个论断的理由是,地缘政治关系的主体就是政治行为体,唐末的主要政治行为体不是唐朝中央,而是几个实力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如朱全忠集团、李克用集团等,而唐中央自遭受黄巢起义的沉重打击后,已经失去了主要政治行为体的地位,仅保留了名义上的中央政府。从唐末的政治与军事形势看,至迟在黄巢义军失败后不久,全国的政治重心便已经开始向东转移了。中和三年(883年),唐廷任命朱全忠为宣武节度使。从此,朱全忠以此为基地不断向外扩张,吞并邻镇,至天复元年(901年),已基本控制了中原地区,“自蒲、陕以东,至于海,南距淮,北距河,诸镇皆为朱全忠所有”<sup>②</sup>。这一时期,北方诸镇中能够与朱全忠集团相抗衡的,唯有割据于河东一带的李克用、李存勖集团,双方争夺的焦点已不在关中,而是在河南与河北地区。

五代十国初期,河东集团与后梁争夺的焦点依然在河北与河南,尤其是河北地区,更是双方必争之地。此后河东李存勖集团以河北为基地,不断地向河南地区进攻,终于灭了后梁,建立了后唐王朝,但统治中心仍在中原地区。后来的晋、汉、周诸朝,均将都城设在河南地区,以中原为政治中心,北宋时期亦是如此,所有这一切都标志着西北地区在全国地缘政治中的地位大为下降了。

北宋前期,为了防御契丹族建立的辽国,保卫中原地区的安全,把防御的重点放在了河北与河东北部一带,军事力量与物资配备也都向这一地区倾斜,此时的西北地区并不为宋廷所重视。随着西夏的兴起以及实力的逐渐强大,北宋所受

到的威胁越来越大,西北地区始受关注,在全国地缘政治中的地位也愈来愈重要。此后,金国为了进攻南宋和防御蒙古大军对中原的进攻,也将这一地区作为进攻的基地和防御的重点。随着西北地区军事战略地位的提高,对其地缘经济与地缘文化的关注不可避免地提高了,对民族关系的调整也成为这一时期诸国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西北地区发生的这些变化以及对整个宋金时期全国地缘政治的影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问题,然而仅将这一问题论述清楚还不够,还必须把这一时期西北地缘的特点搞清楚,惟其如此,才能将这一时期的西北地缘情况与其他历史时期区别开来。

## 二 北宋时期西北地区的地位及变化

北宋时期的西北地区,主要指河陇与陕西地区,前者的地理范围,是指今六盘山以西、新疆以东,包括河西走廊及其南北边缘地带以及今青海省的部分地区;后者,在北宋初期指陕西路所辖区域,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分陕西沿边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又分为永兴军路与秦凤两路。此后,在行政区划上还有分合变化,恕不一一叙说。不过,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所置的陕西路地理范围很大,包括今陕西、宁夏的长城以南、秦岭以北,甘肃东南部,甚至包括山西西南部和河南西部等地区。本文所涉及的西北地区,除了河陇地区外,主要指原陕西境内的秦凤路与永兴军路。

### 1. 前期情况

在北宋初期,这一广大地区分布有众多的民族,主要有汉、吐蕃、回鹘、党项、达怛等民族,并先后有归义军、唃廝囉、西夏、沙州回鹘、甘州回鹘以及草头达怛等政权或部落分布。这一时期,分布在西北地区的这些民族或政权大都与北宋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且大都在北宋的册封体系之内,甚至保持着朝贡关系。归义军与北宋政府的关系自不用说,在敦煌文书中保留了大量的这

① 如高自厚《五代以来西北民族文化交流的缩影》(《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李蔚《略论金朝统治时期的西北屯田》(《兰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程龙《论康定、庆历时期西北沿边屯田与宋夏战争的互动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1辑)等。

②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六二,天复元年五月,胡三省注,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553页。

方面的记载,就连吐蕃人建立的唃廝囉政权也屡次派人上表求封赞普之号<sup>①</sup>。至于回鹘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则更加亲密,由于唐朝曾多次嫁公主于回鹘,“故回鹘世称中朝为舅,中朝每赐答诏亦曰外甥。五代之后皆因之”。正因为如此,北宋建立的第二年,即建隆二年(961年),回鹘就遣使朝贺,此后还多次进贡玉团、琥珀、马匹等<sup>②</sup>。党项诸部亦与北宋保持着朝贡关系,且时有举部内迁者,影响最大者当属李继捧的归顺。虽然后来李继迁曾多次率众骚扰沿边诸州,但由于双方实力差距过大,并不能对北宋构成大的威胁,故西北地区在北宋前期的政治格局中并不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北宋遂把主要精力用来对付北方的辽国,在今河北北部、山西北部部署了大量的军队,财政开支中相当大的部分亦用于这一方面。

然而西北地区这种相对稳定的局面不久就发生了变化。李继迁死后,其子赵德明(宋赐其家赵姓,故史书如是称之)即位,改变了其父成策,于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向北宋奉表称臣,宋朝任其为定难军节度使,封西平王,并重开榷场贸易。但是赵德明并未因此停止对宋朝边境的骚扰和掳掠,还不断地向回鹘、吐蕃诸部发动进攻,扩大地盘。当北宋严诏谴责时,他便暂缓这种行为,并不时地向朝廷进贡方物和马匹。因此,北宋政府对赵德明始终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也没有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赵德明便利用北宋的这种麻痹思想,不断扩大自己的地盘。至其末年,管辖之地不仅包括银、夏、绥、宥、静五州,还包括了灵州、西凉府、甘州等河西走廊一带。

## 2. 中期情况

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赵德明死,其子元昊即位,继续蚕食西北诸族的聚居地,统治范围进一步扩大,包括了银、夏、绥、宥、静、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洪、定、威、龙等18个州,即今宁夏、甘肃及内蒙、陕西的部分地区<sup>③</sup>。随着地盘与实力的扩大,元昊的政治野心也愈来愈大,不再满足于向北宋称臣,遂于宝元元年(1038年)正式称帝,改元建国号,但却请北宋进行册立。这说明元昊并没有吞并北宋的野心,只是想割据一方,当一个小皇帝。

元昊称帝极大地震动了北宋朝廷,但直到此时,北宋朝廷中的许多人仍认为“元昊,小丑也,

旋即诛灭矣”<sup>④</sup>。可见直到这时北宋政府仍没有对西北地区以足够的重视。正因为北宋政府对西夏的轻视态度,不愿对其进行招抚,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便开始了对西夏的战争,其结果自然可想而知。随着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等三次大战的惨败,大量兵力和财力的消耗,北宋政府才不得不对西北地区的局势加以重视。为了应对西北地区严峻的局势,北宋政府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一是在陕西沿边设置了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以加强对西夏的防御。二是部署了大量的兵力。“以鄜延路屯六万八千,环庆路五万,泾原路七万,秦凤路二万七千”,共计21.5万人,以牵其势<sup>⑤</sup>。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厢军、弓箭手配合官军作战,总兵力在30万人以上。三是将大量的财力转移到西北方面。宝元元年未用兵时,“陕西钱帛粮草入一千九百七十八万,出一千一百五十一万;用兵后,入三千三百六十三万,出三千三百六十三万有奇。盖视河东北尤剧,以兵屯陕西特多故也”<sup>⑥</sup>。这些变化表明北宋政府已经改变了原先的战略部署,陕西的战略地位首次超过河东等地区<sup>⑦</sup>。

北宋的这一变化与其当时所面临的军事、政治局势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也紧密相关。宋辽之间,在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签订澶渊之盟后,先前那种大规模的军事斗争不复存在,保持和平局面达百年之久。在这种情况下,在北宋全国地缘政治的天平上,北方地区的地位明显下降,西北地区的地位日益凸显。同时由于辽宋关系的缓和,也使宋廷有更多的精力关注与西夏之

① 《宋史·唃廝囉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4160页。

② 以上见《宋史·回鹘传》第14114页。

③ 王天顺主编:《西夏地理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52~57页。

④ 《宋史·吴育传》,第9728页。

⑤ 《宋会要辑稿》兵八之二一,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6897页。

⑥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四《国用考二·历代国用》,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1页。

⑦ 据欧阳修《文忠集》卷一一五《论西北事宜札子》载:河东路驻泊禁军32000余人,就粮禁军62700余人,共计94700余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另据《宋史·兵志五》载,庆历初,河东路总77079人,陕西路,治平初有156873人(第4734页)。这还只是宋朝招募的义勇人数。可见自宋夏交战以来,宋朝在陕西屯驻的兵力已远超河东地区,而且河东的就粮禁军并非常驻之军,如果把这一因素考虑在内,陕西的兵力更为雄厚。

间的问题。

宋仁宗时期,宋夏之间的战争虽以双方讲和而告结束,但这并非西夏战败之故,主要是由于西夏国小民疲、财力有限,所谓“虽夏人每入辄胜,而国小民贫,疾于点集,卤获之利不补所耗,而岁赐和市之利皆绝,一绢之直八九千钱,上下亦厌兵”<sup>①</sup>之故。因此,两国讲和以后,并不能消除西夏对北宋的侵扰,只是规模大小不同而已。正因为如此,宋朝在西北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兵力,以备不测。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苏辙曾说,“虽复近岁无事,而关中之兵至于二十八万。举雍熙天下之众,适以备方今关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于此见矣”<sup>②</sup>。即是说,此时陕西一地之兵数,相当于宋太宗雍熙年间全国的兵力,可见西北之兵自仁宗朝讲和以来未减反增,反映了宋廷对西北地区的重视。而且苏辙这里所说的仅仅是正规军队,还不包括乡兵、弓箭手等义勇在内。据《宋史·兵志五》载,治平初,陕西义勇“十五万六千八百七十三人”。至宋神宗熙宁九年,“永兴军路八万七千九百七十八人,秦凤路三万九千九百八十人”,陕西义勇总计为127 958人。同年,河北东、西路的义勇总数是81 984人,河东路仅为3595人。另据曾公亮记载:鄜延丹坊保安军路(即鄜延路)领有熟户蕃兵9大族12 700人,马1490匹;邠宁环庆路(环庆路)领有247族44 000人,马4390匹;秦陇凤翔阶成州路(秦凤路)领有147族35 600人,马22 470匹;泾原仪渭镇戎德顺军路(泾原路)领有177族13 341人,马5500匹。四路蕃兵总计105 641人,马33 850匹<sup>③</sup>。以上数据为宋仁宗庆历年间陕西诸路所管蕃兵的兵马情况。把正规军、义勇、蕃兵三者相加,则自北宋中期以来陕西拥有的兵力达50多万。由于这些数据不是同一个时期内的,其间还有增减变化,但即便如此,陕西保持四五十万的兵力还是可能的,欧阳修的记载也能证明这一点。他说,“今三十万之兵,食于西者二岁矣,又有十四五万之乡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万之兵,连年仰食,而国力不困者也”<sup>④</sup>。

正是由于西夏在西北地区对宋朝始终存在着威胁,辽国便乘机对宋胁以兵威,以求获取更大的利益。庆历初,辽国派使者刘六符出使宋朝,不费一兵一卒,便将澶渊之盟确定的每年30万岁币增加到了50万<sup>⑤</sup>。北宋之所以屈服于辽

的敲诈,根本原因就在于西夏对其牵制作用,为避免两面作战,不得已只好多输钱物以求自保。

为了抵御西夏的侵扰,宋廷不得不在西北地区寻求同盟者,以求对西夏形成夹攻之势。史载:“议者以为唃廝囉尚在河、隍间,又与元昊世仇,傥遣使通谕朝廷之意,使西戎有后顾之忧,则边备解矣。仁宗然之。”于是在宝元二年(1039年)派刘涣出使唃廝囉,授其首领以官爵,“廝罗谢恩大喜,请举兵助中国讨贼,自此元昊始病于牵制”<sup>⑥</sup>。当然这后一句话是夸大之词,与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相符。此外,沙州回鹘在归义军灭亡后,并未屈服于西夏,庆历元年(1041年)还曾遣使于宋,表示愿意率众抗击西夏,直到十几年后,才与宋廷断绝了联系。然西州回鹘与宋廷的联系却没有中断,直到神宗熙宁年间,其使者还多次入朝进贡。宦官李宪视师陕西时,神宗还命其派人出使回鹘,“使谕回鹘令发兵深入夏境”<sup>⑦</sup>。于阗国也加入到对西夏的战争中,绍圣四年(1097年),“于阗黑汗王阿忽都董娥密竭笃使其子诣京师,上表言:‘緡药家作过,别无报效,已遣兵破夏国瓜、沙等三州。’哲宗诏厚答之”<sup>⑧</sup>。虽然回鹘、吐蕃、于阗没有对西夏形成大的威胁,但牵制作用还是有的,以至于西夏在河西地区的辖地日渐缩小。这些政策的出台,说明北宋朝廷已经改变了前期那种忽视西北地区重要战略地位

① 苏辙:《龙川别志》卷下,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7页。

② 苏辙:《栞城集》卷二一《上皇帝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68页。

③ 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一八上《边防》,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欧阳修:《文忠集》卷四五《通进司上书》。

⑤ 《宋史·叶清臣传》,第9853页。张金铎《后晋“岁输”浅议》(《史学月刊》2011年第1期)一文,将庆历时新增的这20万银绢称之为“纳”,作为关南的代税之物,意思是说与岁币不是一回事。其实这只是提法上的差异而已,就其实质而言,仍是岁币,因为关南之地为北宋实际占领的疆土,却给不是这块土地的主人辽朝输送银绢,不是岁币又是什么呢?正因为就性质而言,它们均为岁币,所以北宋末年宋金和谈时,金人便以此为据,向北宋索要50万岁币,而且宋朝也答应了金人的这个要求。《金史·宗望传》亦载,“征岁币于宋,以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云云。

⑥ 魏泰:《东轩笔录》卷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3页。

⑦ 《宋史·回鹘传》,第14117页。

⑧ 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三〇,续修四库全书第33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31页。

的态度<sup>①</sup>,对这一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

除了上述寻找盟友的举措外,宋朝还采取了广置屯田的办法。这一办法早在仁宗庆历之前就已经开始实施,只不过当时的目的只是为了解决军食问题,并非针对西夏。宋夏战争爆发以后,设置屯田的地区和面积进一步扩大。广置屯田除了可以补充巨大的军费开支外,更重要的是,屯田多由弓箭手、蕃户耕作,平时从事耕作,农闲练习武艺,并修筑了大量的堡垒,既可以保护屯田人员的安全,同时还可以起到防御西夏侵扰的军事作用<sup>②</sup>。此外,北宋调整了对西夏的军事策略,采取了筑城修堡、加强防御,择将练兵、严肃军纪、厚养边兵、善待边民等一系列措施,尤其在范仲淹、韩琦等人主持西北军政事务时,执行得最为得力。从整体上看,这些措施虽然仍属于防御性质,但却是一种积极防御,改变了原先那种消极防御的态势,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西夏的侵扰活动<sup>③</sup>。

为解决西北边患,自宋神宗时始,宋廷对西夏发动了一系列的大规模攻势,最终扭转了在西北地区的被动局面。宋神宗朝对付西夏的策略,主要是攻取河湟地区以断西夏左臂,攻取横山以断其右臂,形成对西夏左右两翼夹击的态势。熙宁四年至六年(1071~1073年),经大将王韶的努力,收复了熙、洮、岷、叠、宕等州,幅员二千余里,斩获反抗的蕃部19 000余人,招抚大小蕃族30余万帐<sup>④</sup>,获得了北宋建立以来在西北地区的最大胜利。但是,这样又引发了另外的问题。随着北宋辖地的西扩,不可避免地与吐蕃发生冲突。于是,西夏改变了原先与吐蕃为敌的策略,转而与其联合,共同对付宋朝。北宋内部在策略上也有争议,因此其间的反复是难免的,但最终在政和六年(1116年)全部收复了河湟地区,并在这里设置了熙河路,从而在西夏左翼形成了一道攻守兼备的巩固防线。

### 3. 后期情况

熙河路的建立标志着北宋政府对西夏战争的重大胜利,有了这一胜利,再加上争夺横山战略目标的实现,北宋从根本上确立了对西夏战争的主动地位,使其再也难以构成对北宋的威胁。

所谓“横山,即古桥山……俗称小南山,为横山主峰,高出地面一千二百尺,与宁条梁之草梁山相连,直接宁夏诸山,横亘千余里”<sup>⑤</sup>,位于今

陕西北部。宋人所说的横山,主要指桥山的北部地带,横亘于银、宥、夏三州境内,是两国分界之山,山北归夏,山南则是宋境。宋人种谔说:“横山延袤千里,多马宜稼,人物强悍善战,且有盐铁之利,夏人恃以为生;其城垒皆控险,足以守御。”<sup>⑥</sup>可见横山对西夏而言,具有极重要的经济、军事意义,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处于极为有利的地理位置。对北宋而言,西夏占据横山,处于居高临下的有利位置,北宋沿边诸州如邠、宁、环、庆、延、绥、坊、鄜等均暴露在其眼底之下。正因为如此,横山成为宋夏双方必争的要害之地。夺取横山与攻取熙河之地,都是北宋战胜西夏的重要战略部署,即所谓“遂渐夺其横山之地,又旁取熙河、湟、鄜以制之”<sup>⑦</sup>。早在仁宗庆历年间就已提出夺取横山之议,历经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四朝数十年的努力,至宣和元年(1119年)才大败夏军,夺取了横山地区。此战之后,由于西夏失去了横山险要之恃,“疆地日蹙,兵势亦衰,遂以辽国书致鄜延帅刘焄,请纳款谢罪”<sup>⑧</sup>。宋廷同意其请和,并为之罢六路兵。从此,西夏再也不能在西北地区对北宋形成威胁,但是此时离北宋灭亡也已为时不远了。

综上所述,北宋政府虽然在前期一度将军事防御重点放在河北、河东北部一线,西北地区的战略地位有所下降,但至少从真宗时起,西北地区重要的地缘意义日益显现出来,在仁宗、神宗时期甚至处于全国最重要的地位,并且一直持续到北宋末年为止。可见,在北宋统治的一百几十年间,在绝大部分时间内,西北地区都具有最重要的战略地位,全国的经济与军事资源也都向这

① 参见李华瑞《论宋夏争夺西北少数民族的斗争》一文。

② 参见程龙《论康定、庆历时期西北沿边屯田与宋夏战争的互动关系》一文。

③ 相关研究,参见王天顺《试论宋、夏战争中双方战略地位的转化》(《宁夏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李丛昕《范仲淹在宋夏战争中的战略思想及治军用人方略》(《固原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4期)、程龙《论康定、庆历时期西北沿边屯田与宋夏战争的互动关系》等。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七,熙宁六年十月辛巳,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022~6023页。

⑤ 民国《横山县志》卷1,“地理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9年版,第36页。

⑥ 《宋史·种世衡传附种谔传》,第10747页。

⑦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西夏扣关》,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46页。

⑧ 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三三,第558页。

一地区倾斜。因此,可以说北宋一朝政治重心虽在中原地区,但军事重心却在西北地区,西北地区在地缘上长时间处于全国最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有一种学术观点影响颇大,即认为北宋始终实行了“守内虚外”的国策,近年来已有学者撰文对此提出质疑<sup>①</sup>,从以上所述情况看,所谓“守内虚外”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 三 金代西北地区的地位及变化

关于这一时期西北地区在全国地缘政治中的地位问题,应从两方面进行分析,即分别从南宋与金朝两个角度来论述这个问题。对于这两个对峙的政权来说,西北地区的经济与战略地位是各不相同的,下面分别进行论述。

#### 1. 宋金时期

对于建炎时期的南宋政权而言,陕西对其应该具有更加重要的战略意义。靖康之变,宋廷丧失了广大的中原地区,接着金兵南下,将宋高宗追得四处奔走,仓皇逃命。幸有各地将士和广大抗金义军的拼死抵抗,才将金军打回到淮水一线。此后金军暂时放弃了南下江淮的计划,全力攻取陕西;而宋廷也委派张浚为统帅,统一指挥陕西五路军队,想一举击败攻陕金军。为什么宋金双方在这时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移到了西北地区?争夺对陕西的控制权对双方各有什么战略意义?这些都是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

首先,陕西沃野千里,农业生产比较发达,谷麦甚多;熙河森林茂密,公私仰足,农牧业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此外,“秦地形胜,精卒良马之所自出,实军国之根本”<sup>②</sup>。在宋代,西北之民勇悍善战,陕西之兵被认为是最精锐的军队,南宋初年的主要战将大都出自西北,宋高宗曾说:“至如陕西五路,劲兵良将所出。”<sup>③</sup>北宋时在陕西置有买马司的专门机构,负责国家用马的交易和供给,每岁买马约为四万匹,对宋代军事用马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次,西北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南宋虞允文说:“恢复之时,而形势便利莫如陕西,盖得兵得马得粮,可以壮国威,可以足军饷,欲守则有险可恃,欲战则有资可凭。自古进取天下,固有次序,而莫先于此。”<sup>④</sup>南宋初年的宰相李纲也说:“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足以复中原而有西北。盖天下精兵健马,皆出于西北。”<sup>⑤</sup>可见陕西对南宋来

说,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对南宋初期的金朝来说,夺取广大的西北地区,除了具有削弱南宋军事实力、扩大地盘、掠夺战略物资的意义外,更重要的是,可以消除来自西部的军事威胁,保证中原地区的侧翼安全。金人进攻陕西还有一层更深的用意,在其南下江淮失败后,认识到仅从一面进攻南宋是难以成功的,如果能夺取陕西,进而拿下川蜀之地,然后顺江而下,两面夹攻,则不难灭亡南宋,占据全国。在这一认识的指导下,金军遂在建炎四年(1130年)发动了攻取陕西的富平之战。战争的结果是,宋军大败,数十万大军溃散,丧失了大批粮食、马匹及军事物资,除阶、成、岷、凤、洮五州及凤翔府的和尚原、陇州之方山原等几处地方外,陕西五路几乎丧失殆尽。此战的失败,南宋不仅失去了实现中兴、恢复中原地区的战略基地,还失去了良马的供给地<sup>⑥</sup>,并且把川蜀之地直接暴露在金军攻击目标之下。此后连续爆发的和尚原之战、饶风关之战、仙人关之战,对于金军来说,都在于实现夺取入川之路,进而攻取川蜀之地的战略目标,但是这些战役均以金军战败而告终,使其上述战略目标无法实现,而且损兵折将,损失严重。金人“本谓蜀可图,既不得逞,度(吴)玠终不可犯,则还据凤翔,授甲士田,为久留计,自是不妄动”<sup>⑦</sup>。后来金人改变策略,废去傀儡刘豫政权,与南宋讲和,并一度将河南、陕西地归还南宋。但是很快金人就反悔了,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金军兵分两路向南宋大举进攻,被宋将岳飞、刘锜、张俊、韩世忠等打得大败,不得已只好再次与宋议和。次年,和议达成,东南以淮水为界,西北以大散关为界,割商、秦之半于金,南宋每年向金进贡大量金帛,史称“绍兴和议”。

① 李合群:《北宋“守内虚外”国策质疑》,《史学月刊》2009年第12期。

②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一,绍兴九年八月庚午,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110页。

③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七,绍兴九年四月庚午,第2071页。

④ 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九三《经国》,明崇祯八年刻本。

⑤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建炎元年七月乙巳,第184~185页。

⑥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九“绍兴元年十一月丁酉”条记,“自五路既陷,马极难得”(第870页)。

⑦ 《宋史·吴玠传》,第11412页。

从此以后,金朝便占据了西北广大地区,置有京兆府路、临洮路、凤翔路、鄜延路、庆原路,仍称陕西五路。由于这一地区与南宋、西夏接壤,战略地位重要,故金朝在这里依然部署有大量的军队。据《金史·兵志》载,“凡边境置兵之州三十八”,陕西五路就占了16个,占42%。金朝对西北地区的重视于此可见一斑。此外,金朝还在这一地区兴水利、开屯田、置榷场、伐森林,从而使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程度的恢复和发展<sup>①</sup>,为后来金朝抗击西夏、蒙古的战争提供了坚实的经济与军事支持<sup>②</sup>。金朝在其入主北方之初,就在陕西部署了大量兵力,因为在宋金战争激烈进行之时,西夏多次派军队进攻。金因忙于对付南宋,又担心夏与西辽联合,故不得不多次割地给夏,从而使双方维持了比较稳定的和平关系。直到蒙古入侵之前,金夏双方除了海陵王正隆年间、金章宗明昌年间有过两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外,基本上保持了和平关系。金朝统治末年,蒙古大军攻夏,夏向金求救,金拒绝出兵援救,导致西夏对金进行军事报复,双方的战争持续了十余年,给双方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sup>③</sup>。此外,金朝进攻南宋时,往往要从陕西进攻川蜀,以收两面夹攻之效。如海陵王正隆六年(1161年),金军南下江淮大举攻宋,同时命徒单合喜为西蜀道行营兵马都统制,由凤翔攻打大散关,企图打开入蜀之道。正由于这些缘故,有金一代始终在陕西驻有大量的军队,使西北地区在全国地缘政治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不过客观地看,由于金朝的统治中心毕竟不在西北,在战略上其对南宋的重视程度也远远超过西夏,故军事上沿淮一线的重要性要超过西北地区,在经济上对中原地区的依赖更是远非西北可比,对这一点还是要有正确的认识。

## 2. 金蒙时期

金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年),金蒙爆发战争,蒙古军队攻破金的北部防线,歼灭金军数十万。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蒙古大军包围金朝的中都,迫使金朝接受屈辱的条件,索取大量金帛子女而去。为躲避蒙古攻势,同年金迁都汴梁,西北地区在全国的地缘意义亦随之发生了变化。为了加强汴梁所在的中原地区侧翼的安全,金于次年设置了陕西行省,“谕陕西,坚守延安、临洮、环、庆、兰、会、保安、绥德、平凉、德顺、镇戎、泾原、鄜、坊、邠、宁、乾、耀等处要害。分渭

南州郡步兵屯平凉,令宣抚使治邠州,副使治同州之澄城以统之。更以步骑守沿渭诸津”<sup>④</sup>,使陕西的地缘地位骤然上升。与此同时,金廷还进一步加强了潼关、陕州一线的防御,将陕州升为节镇,又将京兆府下辖的虢州改为陕州支郡<sup>⑤</sup>,将驻扎在同州、华州的步骑改归陕州宣抚司统率。还在汴梁以西增兵万余,以加强京西的防御<sup>⑥</sup>。同年十一月,调抗蒙名将河北西路宣抚副使田琢率所部人马屯陕州以备缓急<sup>⑦</sup>。有了这样两层防线,金廷自以为汴梁以西的防御固若金汤了。

金廷之所以大力强化陕西、潼关等汴梁以西的防务,与蒙古所制定的攻金战略直接相关。贞祐四年秋,蒙古乘金南迁未稳之机,直捣汴梁,成吉思汗派拔都领精骑万人由西夏掠京兆,攻潼关。被潼关守军击退后,乃由嵩山小路趋汝州,绕出东面袭破潼关,直赴汴梁。金廷立即调集精兵良将护关守河,拱卫京师。十月,“花帽军”击败蒙军于汴梁西郊的杏花营,迫使蒙军自三门、析津履冰渡河西去<sup>⑧</sup>。这次蒙军深入中原震惊了金廷,金方除了继续加强陕西、潼关的防御力量外,还着重加强了黄河北岸的河中、孟州、卫州一线的防御,形成了更为严密的防御体系。在此后的十余年间,蒙古军队多次从正面渡黄河进攻金朝,但都被挫败,最后只好改变进攻策略。

蒙古的进攻策略就是先攻灭西夏,然后攻占陕西,再入潼关,配合正面大军,一举攻破汴梁。西夏小国军力有限,又失去了宋、金的支援,遂在西夏宝义二年(1227年)被蒙古灭亡。与此同时,蒙古连下洮、河、西宁等州。窝阔台即位后,又连续攻下凤翔、京兆、蒲城、韩城等地,基本控制了陕西地区。金朝重视陕西的防御,目的在于保卫中原的汴梁,而防守陕西的外围屏障却在于西夏,西夏的亡国遂使陕西直接暴露在蒙古的攻击之下,该地的丧失乃是早晚之事。陕西丧失

① 参见李华瑞《论金朝经营陕西》一文。

② 参见李蔚《略论金朝统治时期的西北屯田》一文。

③ 参见刘建丽《略论西夏与金朝的关系》(《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一文。

④⑥⑦ 《金史·宣宗纪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11~312、311、314页。

⑤ 《金史·地理志下》,第642页。

⑧ 《宋史全文》卷三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04页。

后,金朝在西面防线就只剩下了潼关,但是蒙古对潼关、蓝关却屡攻不克<sup>①</sup>。金哀宗正大七年(1230年)秋,窝阔台亲率大军40万直攻潼关,仍然没有攻下,遂又派军自关南山区绕道进攻,也被金军挫败。只好再从正面渡河攻金,也没有能够得逞。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只好重新抬起了成吉思汗制定的灭金策略。这个策略是其临终前亲口所授,大体意思是:“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sup>②</sup>次年,蒙古大将拖雷率军假道于宋,迫使金廷调关河防御大军往邓州抵御拖雷,窝阔台乘虚攻取河中,强渡黄河,迫使潼关守将投降,从而彻底打破了金朝的防御体系<sup>③</sup>。但是如果失去陕西的丧失,蒙古假道南宋迂回进攻的战略仍然不能实现,可见陕西的得失乃是蒙古能否实现这一战略的关键。金朝的彻底灭亡虽在数年之后,但这只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其灭亡自陕西丢失就已经注定了。

随着金朝的灭亡,蒙古便把进攻的矛头对准了南宋。蒙哥汗时期所制定的灭宋策略,可以概括为“图蜀灭宋”四个字<sup>④</sup>。其在位期间,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方略进行部署的。公元1258年,蒙哥亲率大军入大散关,向川蜀进攻,欲攻占这一地区后,再顺江南下,与其他几路军队会师于鄂州。又命忽必烈率军直取襄汉,命兀良合台率安南、云南等地军队北上,进攻潭州,然后再直趋鄂州。从这一部署看,蒙哥所率的这一路大军无疑是进攻的主力,而其进攻的基地无疑是陕西,它为大军提供了人力、物力上的支援。早在此前,忽必烈受封于陕西时,“遣王府尚书姚枢立京兆宣抚司,以孛兰及杨惟中为使,关陇大治”<sup>⑤</sup>,从而为实施这一战略部署奠定了基础。可见,此时的陕西在灭宋战争中仍具有较重要的地位。蒙哥汗死后,忽必烈继承汗位,灭亡南宋的战略发生了变化,所谓“攻宋方略,宜先从事襄阳”<sup>⑥</sup>。自此之后,陕西的战略地位便下降了。

#### 四 宋金时期西北地缘的特点

在宋金时期的三百多年间,由于政治中心的东移,西北地区在全国地缘政治中的地位已不可能与汉唐时期相比,但也不是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其主要特点如下:

首先,地域范围已经大为缩小。以唐代为例,唐代的西北地区不仅包括今青海、宁夏、甘肃、新疆等省区在内,疆域最大时还曾越过帕米尔高原,达到其以西广大地区,大体包括咸海以东、伊塞克湖(热海)以西、巴尔喀什湖以南以西地区,即楚河(碎叶水)、阿姆河(药杀水)、锡尔河(乌浒河)流域的广大中亚地区。至于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更是远至西亚、南亚乃至欧洲,充分展现了一个世界级强大帝国宏大的气概。宋金时期的西北地区主要指陕西四路(五路),即使把西夏占据的河西地区算在内,最远也不过到达沙州,沙州以西便不在其内了。之所以谈这个问题,是因为地域的大小与一个地区地缘地位的重要与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其次,区域内的民族与政治关系异常复杂。在唐代,西北地域广大,域内民族与政权众多,就数量而言,远远超过宋金时期。在安史之乱以前,由于唐朝一强独大,因此这一地区的民族和政权都得围绕着唐朝的指挥棒转,政治关系发展的线索比较清楚。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实力有所削弱,吐蕃的影响随之增强;吐蕃衰落后,回鹘取而代之,发展线索也是比较清晰的。但在宋金时期,西北地区基本上是北宋、党项、吐蕃、回鹘四支势力在进行角逐,其中北宋与党项的势力较强,但都不具备压倒性的优势,因此政治关系就显得复杂一些。总的来看,北宋的优势在经济、文化方面,党项(西夏)的优势在军事方面,吐蕃与回鹘的优势则在地理方面,这些势力之间有斗争又有联合,政治形势一度非常复杂。斗争的结果是:党项在军事上取得了较大的胜利,控制了更大的地盘,压缩了吐蕃、回鹘的生存空间,但却从来没有完全控制过这两个民族。以瓜、沙为例,西夏虽然占据了城市,但沙州回鹘的势力仍然顽强地存在着,这一点从宋元时期敦煌莫高窟众多的回鹘题记就可以反映出来<sup>⑦</sup>。此外,党项

①③ 《元史·太宗纪》,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0、31页。

② 《元史·太祖纪》,第25页。

④ 王炎:《宋元战争中蒙方战略决策的效能比较》,《内蒙古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⑤ 《元史·世祖纪一》,第59页。

⑥ 《元史·世祖纪三》,第116页。

⑦ 刘玉权:《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页。



的势力也从未发展到河湟地区,仅对河西的部分吐蕃部落有所排挤和打击,反倒是北宋对河湟地区有所控制,但却长期未能得到巩固,直到北宋末期才算基本稳定下来。由于吐蕃、回鹘、党项的经济形态均为半农半牧,显得比较单一,相互之间没有互补性,所以它们在经济上均对北宋有较大的依赖性,这就决定了它们与中原王朝虽有战争发生,但结果总是以讲和而告结束,这一点在北宋与西夏的军事斗争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因此这不能不说是这一时期西北地缘政治上的一个鲜明特点。

北宋灭亡后,金朝取代了其在西北地区的地位,但与北宋时期不同的是,金朝势力仅盘旋于河陇的外围,未能深入到河陇地区,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影响力,都不能与北宋相提并论。

再次,西北地区的地缘意义更多地表现在军事方面。北宋时期,宋辽之间除了前期发生过几场战争外,自澶渊之盟后,双方基本处在和平状态。自此之后,北宋对外战争的主要对象就是西夏。宋夏对峙时期,西北地区是双方角力的主要战场,几乎所有的战争都在这一地区进行,因此北宋的军事资源几乎全部用在西北地区,从而使这一地区在全国的地缘意义骤然提升。金朝攻占中原地区后,宋金之间为了争夺西北地区,也爆发了一系列的战争。对金朝而言,夺取西北的目的在于打开入川道路,配合南下金军夹击并进而灭亡南宋;对南宋而言,控制住西北地区则可以作为复兴中原的基地,从侧面威胁中原的金军。金朝末年,西北再次成为军事斗争的热点地区,金、西夏、蒙古三方在这里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激烈争夺。这一地区之所以成为这一历史时期军事斗争的热点地区,除了其所具有的重要战略地位因素外,民族关系非常复杂、民族矛盾比较激化,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诸种因素的交错,遂使这一地区变成了炽热的火药桶,从而形成了这一时期西北地缘政治上的又一个鲜明特点。

最后,谈谈西北地区的地缘经济与文化意义。前面已经指出,任何地缘政治都离不开地缘经济与地缘文化的互动影响,宋金时期西北地区的情况亦是如此,其不仅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方面亦具有一定的地位。在宋代,虽然海上对外贸易的繁荣程度已经超过了陆上,但是通过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与中原进行贸易,对于西北诸族乃至西域地区仍然非常重

要,只是繁荣程度达不到汉唐时期的水平而已。在北宋初期,这种贸易通道经河西走廊到达灵州,然后再辗转到达中原地区。灵州被西夏攻占后,则转道青唐(河湟),再经陕西到达中原地区。在这一时期,围绕着对丝绸之路贸易权的争夺,展开了一系列激烈的斗争。在这场争夺战中,吐蕃对往来其地的商贾和贡使采取了保护措施,回鹘因为西夏直接侵害了其商业利益,在宋朝的鼓励下,多以军事手段进行反击。熙宁六年(1073年),回鹘遣使入贡,“神宗问其国种落生齿几何,曰三十余万;壮可用者几何,曰二十万”<sup>①</sup>。就此来看,其实力与西夏比虽不占优势,但也使其不敢小视。此外,远在西域的于阗也卷入了这场斗争,以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由于这些民族或政权对宋朝经济的依赖,遂使宋朝在与西夏的斗争中,又多了一个经济方面的有利条件,宋廷曾明令“其鄯延、环庆、泾原招纳蕃部等费用,许支封桩钱”<sup>②</sup>。由于宋廷不惜血本“以得其欢”,“以回其意”<sup>③</sup>,因此就西北诸族的向心力而言,西夏是远不能与北宋相比的。当然,这种经济交流并非全是单向的,宋朝同时也满足了自己的需求,如其对畜产品尤其是马匹的需要,就是一例。

至于文化方面的交流以及西北诸族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已有学者进行过专门论述<sup>④</sup>,不赘。在宗教方面,这一时期的吐蕃、回鹘、党项等族无不信仰佛教,西夏曾多次向北宋求取《大藏经》,宋廷也多次赐予,仅《宋大诏令集》中就有不少记载。此外,回鹘也提出过类似请求,如熙宁元年(1068年)遣使入贡,“求买金字《大般若经》,以墨本赐之”<sup>⑤</sup>。至于往来的僧侣更是频繁,从而极大地促进了西北地区佛学水平的提高,而宗教的交流也是文化交流的内容之一。

收稿日期 2011—01—02

作者杜文玉,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陕西,西安,710062。

【责任编辑 惟 正】

①⑤ 《宋史·回鹘传》,第14117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三,元丰四年六月壬午,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594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庆历元年五月甲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133页。

④ 高自厚:《五代以来西北民族文化交流的缩影》。